

#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活动

## ——以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为中心的考察

宋 俭,刘力维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活动中诞生的。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研讨和宣传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形式,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几乎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团体的基础上建立的。以董必武、陈潭秋等为代表的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他们还历史地承担起了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任务,推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主要不是由工人运动直接推动而是由先进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活动直接推动,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一个重要特点。重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即形成的一大传统,并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和发展的全过程。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武汉早期党组织;理论学习;理论教育

**中图分类号**:D 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1)04-0011-08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1.04.003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共产主义使命型政党,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为共产主义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筹备建党之时就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崇高使命明确写进了自己的宣言中:“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sup>[1]</sup>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建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前提,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建立起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伟大的认识工具”,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来解决中国问题;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担当,他们到工人中去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的”<sup>[2]</sup>，“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sup>[3]</sup>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重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主要法宝。本文拟以中国共产党武汉早期组织成员为主要分析样本,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活动的考察,揭示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史的这一重要传统和经验。

## 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

石川祯浩指出:“无论在哪个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是成立共产党的最重要的必要条件”<sup>[4]</sup>。

收稿日期:2021-04-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党性教育的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20&ZD022)。

在中国也是如此,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看,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讨、翻译、宣传活动中,产生了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几乎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团体的基础上建立的,如上海早期党组织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建立的,北京早期党组织是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建立的,长沙早期党组织是在俄罗斯研究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济南早期党组织是在“康米尼斯特”(英文“共产主义”音译)学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武汉早期党组织的情况稍有不同,是由上海早期党组织联系武汉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的,武汉早期党组织成立后,即“分别在武昌、汉口领导建立公开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sup>[5]</sup>。广州早期党组织的情况与武汉相似,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先成立党的早期组织,而后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理论学习中了解马克思主义,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进而建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的特点,从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成员身上都能看到这一特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李达、蔡和森、周恩来等都是如此,在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身上,这一特点同样表现得非常突出。

董必武是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的主要代表,也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1919年春,董必武在上海渔阳里《新青年》编辑部遇到了湖北同乡李汉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李汉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者之一,他在留学日本期间,深受河上肇、堺利彦等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通过大量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而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于1918年底回国,后成为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早期党组织的主要成员,他译介过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翻译的马尔西著《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是《资本论》在中国最早的通俗读本,被认为“占据了我国初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地位”<sup>[6]</sup>。董必武在回忆中谈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我从鄂西到上海,这时,李汉俊(湖北人)从日本毕业回来……经常和我闲谈社会活动情况,有人说俄国是过激党进不得,马克思主义的书看不得。当时有股劲,你说看不得我非看不可。我们就想法了解俄国革命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入门》,看政治经济学入门。”<sup>[7]</sup>董必武明确谈到,自己的“思想转变是1919年在申(即上海)”,那时“李汉俊刚从日本回国,常谈俄国消息。五四运动后,我们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先看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书。从李汉俊那里知道许多俄国的消息。看《资本论入门》和考茨基的书”。正是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他“逐渐明了俄国革命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sup>[8]</sup>从董必武的回忆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在李汉俊的影响下,通过研读各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读物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过程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另一位重要成员陈潭秋则是受到董必武的影响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1919年6月中旬,作为武汉地区五四学生运动主要领袖的陈潭秋随武汉学生代表团到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结识了正在上海的董必武,董必武为陈潭秋介绍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俄国革命书籍和国内进步书刊,并悉心指点,两人在一起研读交流了两个多月,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后来董必武在回忆中谈到:“由于志同道合,我们一见如故,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同时商定回汉后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sup>[9]</sup>1920年3月,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昌创建了私立武汉中学,学校引进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供师生传阅和学习,一批担任教师的进步知识分子还指导学生们阅读和学习《新青年》《共产党》《星期评论》《觉悟》等马克思主义刊物。董必武、陈潭秋亲自指导学生会主办《武汉中学周刊》(后改为月刊),编写《政治问答》交流读书心得,发表宣传革命的文章。武汉中学成为湖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祥地。时人回忆:“湖北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由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几个月后他就不干了)等组织起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传播,在武汉中学内很少受到阻碍”,“董、陈二人在武汉中学学生中影响最显著”<sup>[8]</sup>。

恽代英虽然不是董必武、陈潭秋等发起建立的武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但他与林育南等于1921年夏在湖北黄冈发起建立的共存社也是一个具有早期地方党组织性质的共产主义团体,其宗

旨为“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sup>[10]</sup>。共存社的主要成员在中共一大后大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恽代英曾经信奉过无政府主义,他自承:“我信安那其主义已经七年了,我自信懂得安那其的真理,而且曾经细心的研究。”<sup>[11]</sup>1920年初,恽代英与林育南等创办利群书社,经销《新青年》《星期评论》《湘江评论》等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刊物,由是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与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联系。受到他们的影响,他开始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尤其对唯物史观发生了深深的兴趣。1920年下半年,恽代英受陈独秀的委托翻译考茨基的《阶级斗争》,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作了较深刻的分析,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并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作了简要描绘。“此书的翻译对恽代英同志的政治思想的提高,起了重大作用”<sup>[12]</sup>。显然,恽代英也是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斗争》一书不仅对于恽代英的思想转变起了重大作用,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著作阅读史上亦影响甚大,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中有不少是通过阅读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新青年丛书”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后来谈到:“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sup>[13]</sup>周恩来也谈到:“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sup>[14]</sup>

1920年9月,中国共产党武汉早期组织建立(董必武回忆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名称为“共产主义研究小组”;陈潭秋回忆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包惠僧回忆为“共产党武汉支部”),最初成员有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郑凯卿、赵子俊,以包惠僧为书记。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中除郑凯卿、赵子俊是工人,文化程度较低,不具备独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能力外,其他如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都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而建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的。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后,即将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首要任务,一是在党组织的活动例会上集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等理论著作和《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是当时武汉早期党组织的主要学习资料;二是建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团体,武汉早期党组织成立后,即分别在武昌、汉口建立了公开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引进步知识分子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三是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1921年春,恽代英、黄负生等创办《武汉星期评论》周刊,每周六出版,创刊不久,黄负生加入武汉早期党组织,该刊实际成为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先后由黄负生、刘子通、李书渠、陈潭秋等任编辑,李汉俊、包惠僧、董必武、陈潭秋、林育南等在该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当时国内较有影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期刊。武汉早期党组织还先后创办了《全民通讯》《反响》《真报》《劳动周刊》(武汉)等报刊<sup>[5]</sup>。

与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一样,各地早期党组织成员也大都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建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的,并在学习、研究中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而成长为共产主义者在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中是具有普遍性的特点。

## 二、在工人群众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

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也重视对党所影响的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理论,必须要掌握工人群众,才会变成物质力量。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并有了建立自己的政党的要求。建设工人阶级的政党,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但是,又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什么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实现

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sup>[15]</sup>他提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然后到工人中去宣传、组织,帮助工人中的先进分子领会科学社会主义,领会工人的历史使命,“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成果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也不能当思想领导者”<sup>[15]</sup>。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来说,尤其如此。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工人阶级的社会生活状况,决定了他们自己不具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条件,而需要“从外面灌输进去”,承担这一“灌输”任务的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而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承担起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并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桥梁。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sup>[16]</sup>。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五四运动时期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而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他们深知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理论,工人阶级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承担,必须要到工人中去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让中国工人阶级掌握自己的理论武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1919年11月1日创刊的《浙江新潮》第1号在发刊词中提出了知识分子要和劳动者联合的主张,呼吁“凡知识阶级里面觉悟的人,应该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投身于劳动界中,和劳动者联合一致。”<sup>[17]</sup>1920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上发表《“五一”(MayDay)运动史》,他在文中写道:“到了今天,中国人的‘五一’纪念日,仍然不是劳工社会的纪念日,只是几家报馆的纪念日;中国人的‘五一’运动,仍然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他号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要实际地到劳工中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唤起工人阶级的“觉醒”<sup>[18]</sup>。这一期《新青年》杂志还发表了反映上海、北京、天津、唐山、武汉、长沙、南京等工人阶级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刊登了专门征集来的12位工人的题词,表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已经明确意识到要到工人中去,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各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都把到工人中去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唤起工人阶级的觉醒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如上海早期党组织在沪西小沙渡开办工人半日学校、北京早期党组织开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广州早期党组织开办机器工人补习学校,用通俗的语言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长沙早期党组织深入湖南工会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教育,济南早期党组织的王尽美、邓恩铭等深入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新城兵工厂、鲁丰纱厂和电灯公司等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开展对工人的宣传教育。同时,各地早期党组织还创办了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刊物。1921年6月10日,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张太雷在致大会的书面报告中,介绍了国内各地早期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的情况:“我们的出版部为工人群众出版许多周刊,如上海的《劳动界》、广州的《劳动者》和北京的《劳动音》以及一个周报《来报》。该部还为工人印刷一系列小册子和传单,如《一个士兵的故事》、《工人对话》、《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人》等。”组织部“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开办了工人学校和工人俱乐部。”报告也专门谈到了武汉早期党组织在工人中开展活动的情况:“汉口组织,它同城市工人,特别是印刷工人保持着牢固的联系。”<sup>[19]</sup>

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非常重视在工人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在早期党组织建立前,董必武、恽代英、陈潭秋等即在工人和平民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1920年4月,恽代英、施洋、李书渠、包惠僧等组织发起湖北平民教育社,“以补救失教育平民并研究督促平民教育之进行为宗旨”<sup>[20]</sup>,他们向民众广而告之:“凡是无力量读书的人,都可以到这里来读书,不要半文钱的学费。”<sup>[21]</sup>同年夏,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钱介磐等创建新教育社和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在武昌开办多所工人和平民及其子女为主要对象实施义务教育的平民学校或工读学校,讲授工人及其他劳动群众求得自身解放的道理。陈潭秋创办湖北人民通讯社,主要发布有关工运、学运的消息及评论,除供给武汉及湖北各报外,还邮

寄至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各大报纸<sup>[22]</sup>。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中的郑凯卿、赵子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为数不多的工人出身的成员<sup>[23]</sup>，他们都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加入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如郑凯卿是武汉文华书院的校工，1920年2月，陈独秀来武汉讲学时住在文华书院，郑凯卿负责照顾其饮食起居，陈独秀向他介绍了《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并教他如何调查武汉工人状况，在陈独秀的影响下，郑凯卿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又受到陈潭秋、包惠僧的影响，并受邀加入武汉早期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工人党员。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后，即“大力从事工人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sup>[5]</sup>。包惠僧、赵子健受派到汉口谏家矶扬子机器制造厂调查工人状况，撰写了《我对武汉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的调查报告。赵子健、包惠僧还通过到郑州铁路职工学校、江岸扶轮学校去当教员的方式深入到工人群众中间，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中共“一大”后，1921年10月至11月，包惠僧受中央派遣回武汉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通过开办工人识字班、工人夜校、工人补习学校、职工子弟学校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据当事者回忆：“这种工人识字班办的很广泛，连兵工厂都打进去了。主要的有三个工厂，即武昌的武汉第一纱厂、汉口的英美香烟厂和汉阳的兵工厂（包括炼铁厂、制枪厂和火药厂）其他如裕华纱厂，震寰纱厂，纱麻四厂、南洋烟厂，还有汉口的一个日本人的纱厂以及铁路工人中都有这种识字班。”<sup>[7]</sup>识字班从认识“工人”、“阶级”等词汇入手，进而通过“我是粤汉铁路工人”等造句的方式，启发工人对自己阶级身份的认同，再在此基础上分析工人阶级受剥削和压迫的根源，唤起其阶级觉悟。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想方设法深入工人中间去开展宣传教育，当时，办工人学校是深受工人欢迎并能够最快接近工人的方法，也最方便开展对工人的教育。董必武在回忆中谈到他和陈潭秋等到武汉中学第二部附近的湖北纱厂去办夜校，做发动工人的工作和组织工会的情况，“那时，我们大多是知识分子，穿着长袍不好到工人中去，我们就到厂里去办夜校，或通过访问学生家长，或通过同乡、亲戚朋友介绍到纱厂去，到车站码头上去，到黄包车工人中去，找工人谈心，讲解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道理”<sup>[9]</sup>。武汉党组织成员还到粤汉铁路徐家棚车站、武昌第一纱厂、汉阳钢铁厂、武汉模范大工厂、京汉铁路江岸车站和郑州车站、汉口租界人力车行做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的工作，开展工人运动<sup>[24]</sup>。如包惠僧、李书渠、林育南等深入粤汉铁路武昌徐家棚火车站，将那里的平民夜校改办为工人补习学校，同时成立工人子弟学校。陈潭秋、项英等经常深入到江岸区的铁路工人中，宣传革命道理。包惠僧在回忆中谈到：“那样的一个荒僻地方，办了这样的一个学校，好像是沙漠里出现了绿洲，大家都觉得新奇，粤汉铁路的员工，大部分的人同这个学校发生了联系。”<sup>[25]</sup>这些工作为后来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的成立，以及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奠定了基础。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sup>[26]</sup>正由于武汉早期党组织对工人群众的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使得这一地区的工人群众较早被发动起来，找到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自己的精神武器”，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工人组织程度较好、觉悟较高、工人运动较发达的地区，并发展了一批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如后来成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主要领导人的江岸铁路工人林祥谦就是在陈潭秋、项英等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而以董必武、陈潭秋等为代表的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也“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工人群众的过程中，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不断地砥砺自己，一步步地成长起来”<sup>[27]</sup>。

### 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中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固然是以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社会基础的，特别是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主要不是由工人运动直接推动而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直接推动的，创建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主要不是由产业工人而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组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中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特别策划

张国焘在回忆中谈到,1920年7月他在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和陈独秀讨论建党问题时,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甚少,文化落后,因此一般工人还谈不上阶级觉悟,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驱。”<sup>[28]</sup>陈独秀说的这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正是五四运动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中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的,也是由这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的。1919年9月,李汉俊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文章宣称:“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sup>[29]</sup>最早发出了要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声音。此后,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开始了建党问题的讨论,而这种讨论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联系在一起的。如当时旅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与国内的毛泽东围绕建党原则问题的讨论,就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的,蔡和森在信中说:要“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毛泽东回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sup>[30]</sup>《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词条中,对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各地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做了简要爬梳,将各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展的主要活动集中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收集、购买各种中、外文马克思主义文献,并进行编译和刊印工作;(二)组织会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习研究;(三)用各形式对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四)参加政治斗争;(五)吸收进步青年,扩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组织;并指出:这些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在团结教育青年,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培养干部、准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对党的发展壮大等方面,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sup>[31]</sup>这种分析是准确的,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对于推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重要作用,国内6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相生相伴的,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密切互动关系。

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同样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呈密切的互动关系。武汉早期党组织是在陈独秀、李汉俊等的指导下建立的。董必武在回忆中谈到:“一九二〇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的基础。”<sup>[7]</sup>包惠僧回忆:1920年“夏秋之交,刘伯垂由广州过上海回武汉,他在上海同陈独秀谈了几次,陈独秀即吸收刘伯垂入党,并派他到武汉发展组织。”<sup>[25]</sup>而据吴德峰回忆,在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前,董必武、陈潭秋等就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成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在各学校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团结教育学生,有的组织读书会,有的组织同乡会,有的组织学会,并利用学生联合会进行工作”。小组还“出版两种刊物:一种是内部发行的,叫《我们的》,油印;一种是公开发行的,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叫《武汉星期评论》。”<sup>[8]</sup>

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后,将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作为党组织的主要工作,要求早期组织每周开会学习一次,每次会议都做读书报告或国内外时事报告。1920年11月,在原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基础上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早期党员和先进知识分子公开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形式,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黄负生、刘子通、施洋等约20余人都是研究会的主要成员”<sup>[32]</sup>。包惠僧后来在回忆中谈到,当时马克思研究会学习的书目主要有“《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杂志,李汉俊译的《资本论浅说》、《共产党月刊》,考茨基著的《唯物史观》,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马克思传略》及关于巴枯宁、克鲁包特金、托尔斯泰的著作及传记”<sup>[25]</sup>。1920年11月7日,董必武、陈潭秋等发起成立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以研究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的思想为宗旨,吸收和引导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扩大了党组织在武汉进步青年中的影响,也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展准备了后备力量。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13名代表中,湖北籍代表就有5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武汉地区建党活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密切互动的成效。

需要指出的是,武汉早期党组织建立前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不是系统的,而是零散的,其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多是介绍性的第二手、甚至三手的文献,真正读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不多,能够读到也

多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受当时翻译水平所限,其中多有不准确不正确之处,这必然影响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董必武在回忆中曾谈到:“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马列主义的东西是很少的,当时有个《共产党宣言》翻译本,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是陈望道译的,政治经济学也是陈望道翻译的,考茨基的《政治经济学入门》。列宁的东西,翻译过来的较晚,大革命时期翻译的比较多。有一本《价值利润》是李季译的,李季看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不少,但是观点比较模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没有的。”<sup>[7]</sup>包惠僧也谈到:当时“对于学习马列主义知识是太少了”,“多数同志几乎是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且“一般同志的思想情况:反对现状,憎恨政府是主要的,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共产主义的远景都有可望而不可及之感!”<sup>[25]</sup>这反映出在党的创立时期,由于当时学习条件的限制,早期党组织成员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缺乏系统性和计划性,基本上是能找到什么就读什么,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水平也不高,这就必然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准确把握。这种情况不仅表现在武汉早期党组织成员的学习中,在各地早期党组织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中也普遍存在,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理论准备不足,一些党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的共性问题。对于这种局限性,中国共产党人较早就有着清醒的认识,刘少奇曾明确指出:“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我党虽有极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但缺乏理论的弱点仍旧未能克服。这是我们今天还要以极大的努力来加以克服的。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这在中国党的大多数同志不论对哪一方面都还有极大的不够,还是中国党一个极大的工作。”<sup>[33]</sup>毛泽东也谈到:“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sup>[34]</sup>因此,他高度重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他向全党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sup>[16]</sup>。“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sup>[35]</sup>他还要求全党要系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出:“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知识。”<sup>[36]</sup>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于中国共产党建设极为重要的意义。

#### 四、结 语

由武汉早期党组织的活动可以看出,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即形成的一大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和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放在突出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全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sup>[16]</sup>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毛泽东一再要求全党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他还提出了要组织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的任务,指出:“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sup>[37]</sup>刘少奇也强调:“现在,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这是一项经常性的任务”,“中国党如果没有很多的理论干部,就不可能领导这样大的国家达到社会主义。”<sup>[38]</sup>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来武装全党,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的一大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遭遇各种风险和考验面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大秘诀。今天,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sup>[2]</sup>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提高全党的理论修养,尤为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sup>[39]</sup>他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要求全党“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sup>[40]</sup>在这种背景下,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的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4]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5] 曾实.中共武汉早期组织成立的前前后后[J].党史天地,2020(1-2):7-10.
- [6] 田子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8]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 [9] 中共黄冈县委.回忆陈潭秋[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 [10] 张影辉,孔祥征.五四运动在武汉(史料选辑)[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 [11]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12] 曾宪林.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武汉早期的传播——李伯刚同志的谈话摘记[J].武汉文史资料,1981(3):7-11.
- [13]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周恩来自述——同外国人士谈话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7] 刘晓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色[J].中共创建史研究(辑刊),2018:10-17.
- [18]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3卷(最新注释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1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 [20]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21] 武汉二七纪念馆,中共竹山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施洋纪念文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 [22] 万京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通讯社[J].百年潮,2016(1):41-45.
- [23] 宋俭,魏维.论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11):4-10.
- [24]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1919.5—1949.10)[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
- [25]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2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28]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 [29] 李汉俊.译完了,我还有几句话要说[N].民国日报-觉悟,1919-09-07.
- [30]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31] 李景田.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
- [32] 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1919—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34] 毛泽东.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N].新中华报,1940-06-28.
-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 [3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 [3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40] 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J].求是,2019(22):4-11.